

第一章 近现代西方经济伦理的启示

近代西方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尤其进入现代市场经济之后，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发展和道德的关系问题十分突出。因此，经济伦理的理论和实践历来为西方的伦理学家、经济学家所关注，并且提出了种种理论和研究方法。西方国家自近代以来，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斯·韦伯，以至现代的形形色色的经济学派和伦理学派都提出各具特色的理论及方法。应当说，它们都提供了一定的积极的合理因素，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加以消化、吸取。然而，我们依据的还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伦理的方法论，依据它的基本原理，融合西方的经济伦理理论和方法论的积极因素，才能为当前经济伦理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正确的研究方法。

德国的科斯洛夫斯基认为经济伦理学或伦理经济学类似于政治经济学，不同的是前者是研讨个人经济行为的道德前提，后者研讨的是国民经济结构的政治、法律前提。他指出：“作为伦理经济学，它是评价伦理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学说，类似于政治经济学，并充实了政治经济学。它从伦理学的角度，探讨个人经济行为的道德前提和背景条件，如同政治经济学探讨国民经济结构的政治、法律前提一样。伦理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两种学说都是以理性行为的形式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① 通常认为法国的

^① 《伦理经济学原理》第 1—2 页

蒙克莱蒂安 (Montchretien) 在 1615 年第一次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这一词的含义经过几百年的变化,形成形形色色的观点,但西方学术界一般都把它理解为研究国民经济结构、运行的科学。^① 科斯洛夫斯基也是作这样的理解的,他把经济伦理学与政治经济学看作类似的科学,并认为经济伦理学充实了政治经济学是有一定道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明,西方学术界至少有一部分人认同研究经济伦理学的内容和方法与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和方法是一致的,或者说是共通的。

一 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因素关系的 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法

经济伦理,简单说来就是要研究和解决经济活动与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研究和解决道德行为与经济活动的关系。一般说来,经济伦理侧重从伦理道德角度去考察经济活动并规范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看,或者从理论层面上考察,经济活动和道德行为的关系是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关系;如果从更为抽象的宏观上考察,两者又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关系。

顺便指出,有人认为知识概念不仅指科技知识而且应包含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不是远离经济发展领域的非经济因素;主张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通过社会化和产业化运作方式,直接参与影响大众的道德规范等高文化产品的生产。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要形成持续供给社会动态分析、制度合理性设计和制度合法性论证的能力。这是极有创新性的观点,非常值得

参阅:《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政治经济学”条目,第968页。

深入研究和探讨。本著作承认并强调道德因素对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积极能动作用，但主张不能因道德等因素的能动作用而不去注意它们与经济因素的本质区别，在一定研究领域中还是要区别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因为道德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参与和影响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但它们本身毕竟还不是经济因素。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孕育、发展，经济活动和道德行为的关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尤其在近代市场经济确立之后，犹如潘多拉魔匣被打开一样，贪婪、自私、欺诈、暴力、掠夺等等一切恶行伺机而出，人类曾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精神牺牲，付出了沉重的道德代价。同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尤其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确立，道德、精神面貌又得到史无前例的进步，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滑坡虽然得到克服，但是新的道德问题又出现了。西方对经济活动和道德行为关系的理论研究，数百年来可谓层出不穷，有众多的学派和观点，积累了很多可供我们借鉴的积极因素和教训。

影响甚为深远，至今仍为人们所关注、争论的观点，是从经济的内在因素或经济运行的规律去统一市场经济中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化解道德与经济之间的对立。其代表人物有 17 世纪的亚当·斯密，以及当代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等。

亚当·斯密在他的名著《道德情操论》中研究人类的道德行为，在另一本名著《国富论》中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并提出人在道德领域中是利他的，而在经济领域中是利己的，两者如何能够统一呢？这就是著名的“斯密问题”。这个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学术界一直在争论，市场经济越是发达越是对此感兴趣。我国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伦理学界和经济学界对“斯密问题”颇为注意，提出种种见解，其中讨论的核心是道德和经济活动之间是如何连接的，个人的求利活动和社会共同利益如何能够统一。按照斯密的观点，这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把两者结合起

来。“看不见的手”指经济运行的规律，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地必然存在的。“看不见的手”如何使道德和经济活动结合起来，如何使人的利他与利己行为统一起来呢？

1997 年我国首次翻译出版了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四位该书的译者，在译者序言中对“斯密问题”作了新解，认为所谓“斯密问题”是对斯密著作误解而产生的，他们提出：“《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这两部杰出著作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无论是对其学术思想体系和对人的行为动机的分析，还是对那只‘看不见的手’的论述，都涉及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因此，所谓‘亚当·斯密问题’实际上是由于误解其著作而产生的。”^①译者认为在斯密那里，无论是道德人还是经济人都是以人的本性是利己的为依据，这是整个道德体系和经济体系的出发点。在道德领域中，通过“看不见的手”使人在社会行为中从利己走向利他；在经济领域中，亦是通过“看不见的手”使人在经济谋利活动中从利己走向利他。这是很有见地、有相当道理的观点。但是，这个几百年来来的“斯密问题”如果只是用人性利己去说明就可以解决了，似乎简单了一点。

从理论上的深层次考虑，所谓“斯密问题”实质上是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关系，非经济因素包含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等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东西，其中伦理道德占有重要位置。英国从封建的自然经济过渡到了以商品经济为主的市场经济，这是个漫长而严酷的过程，发生过“羊吃人”这样震惊世界的现象，当时也引起英国的极大反响。经济发展使人们付出了道德等精神方面的巨大代价，而经济活动又是绝对为了谋利而进行的，如果有不谋利去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人们肯定把他

^① 见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译者序言”第 19 页。

划入疯子一类中去，似乎经济活动中不存在为他人着想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尤其在人际关系中，道德上的堕落触目惊心，这是必须认真对待和急需解决的。社会上和理论界都提出“现在是怎么啦”这样的疑问，既然封建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被彻底抛掉，那么代替的新道德又是什么？这种新道德的依据又是什么？道德领域和经济领域中人们的行为需要重新认识、重新研究，尤其两个领域中人的行为又如何能够一致起来，更加成为思想家极为关注和希冀解决的问题。因此，“斯密问题”不是亚当·斯密心血来潮提出来的，而是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这是一个具有时代性意义的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在亚当·斯密之前及同代已有不少思想家作了研讨，17世纪在英国曾经发生过“人性是利己还是利他”的大争论。正因为如此，对亚当·斯密一生中交叉研究道德问题 and 经济问题就容易理解了。他在1759年出版了《道德情操论》，到他去世前一年该书还修订出版，一共修改出版了六次，说明他一生都在研究道德。他的研究经济的《国富论》在1764年7月就开始撰写，1776年正式出版，他一共修改出版过4次，最后一个修订版是在去世前4年的1786年。可见，斯密一生中交替研究道德和经济问题，始终是想方设法使两者能够统一起来。

按照斯密的观点，人既是道德行为，又是经济活动的承担者、主体，人的本性则是两种行为的出发点，或者说是依据。在斯密之前，英国自从霍布斯提出人的本性利己，当时就受到剑桥大学柏拉图学派的反对，以拉尔夫·柯德华斯（Ralph Cudworth 1616~1688年）为代表主张人性利他论，开始了一场人性的大争论。斯密主张人性利己又是利他，在人性利己基础上的一种人性二元论。在社会生活的道德领域中，人性虽然自私，但是天赋中依然存在一种同情心，它使人走向利他。他说：“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

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① 同情感是人天赋所有的，人人都有，由于心理联想，通过同情使自我体验到他人的快乐或痛苦，从而使人在考虑自己时会走向为他人着想。斯密认为利己就是自爱，是对个人利益的关心和追求，他说：“对我们自己个人幸福和利益的关心，在许多场合也表现为一种非常值得称赞的行为原则。”^② 值得注意和特别要指出的，斯密讲的人性利己指的是人对自己利益和幸福的关心、追求。因此，在斯密看来，个人从关心自己利益转向关心他人利益并不困难，因为人的天性就有同情他人的本性，有理解别人、关心别人利益的需要。在道德领域中，从利己转向利他的依据，根本原因是心理因素——同情与怜悯。

从斯密的道德理论体系来看，自爱、利己的人性是理论前提，同情这一心理因素是关键，结论是人在道德生活中从利己走向利他，用公式可表述为：利己 → 同情 → 利他。应当特别指出的，17~18 世纪英国一批诸如霍布斯、曼德维尔和亚当·斯密等并不认为人性利己是不道德的，是恶的，而是认为这完全是正常现象，它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只有在如何实现利己，或者说如何实现个人幸福和利益时，才会出现一种价值判断，道德才会出现，才会起作用。他们所认同、所追求的理想状态是，既实现个人利益又不损害他人利益，反而增进他人利益，这正是斯密所说的最高的道德情操。因此，斯密认为道德生活中应当利他，并非否定人的利己动机和行为，而是要非常明确地向人们指出道德的

① 《道德情操论》第 5 页。

② 同上书，第 400 页。

人应当把利他作为目标，实现利己和利他的统一。

斯密在市场经济这种历史条件下，当然很清楚地认识到现实生活中人们必须生存、发展，必须适应时代去追逐和实现个人的经济利益，而且是越赚钱、越发财越好。在经济领域中，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因与道德领域中一样都出于人的利己本性，人性利己这一永恒不变的本性在人的任何活动领域中都起决定性的作用。人的利己本性在经济领域中表现为追求个人利益，而且每个人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斯密是从人类经济活动的特点去说明的，认为人类在经济生活中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但是别人为什么要协助你呢？仅仅靠他人的恩惠是行不通的，只有刺激人的利己心，使他知道对同胞有利，就是对自己有利。斯密提出：人们在交易中，“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①在经济活动中，在交易中，人人都只是为自己打算，为了自己的私利才从事经济活动，这是经济领域中的必然性。

假如人人只是利己，那么又如何实际上达到有利他人、社会？斯密提出了著名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本来一个人在其经济行为中并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并不打算使他人受惠，而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能促进公共利益。尽管他只顾考虑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第 13～14 页

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①“一只看不见的手”使个人在经济活动中，出于利己动机，其行为实际上可达到增进他人利益的目的。在斯密看来，公开承认自己经营目的是为了个人私利，比起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的人来得光明正大。因为只要在市场经济中，只要“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那就不管任何个人主观上如何想，即使丝毫都不想为公众谋利益，实际上会不依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地变得有利于他人。

如果说斯密在道德领域中以心理因素——同情来沟通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对立，那么在经济领域中则纯粹以经济因素来消弭利己与利他之间的鸿沟。“一只看不见的手”，就是支配市场经济中自由贸易的经济规律，完全是客观地存在于经济运行中。其实，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已提出“一只看不见的手”这一概念，但不是指道德领域的。他认为人类天性是自私的和追求财富、地位的，它驱使人们去从事经济等活动，生产出大量的消费品，富人也只是消费其中一小部分，他们在人人为己的消费中，客观上也让穷人分享消费品，其中原因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他说富人们“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惟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的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②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已经把道德领域与经济领域中人的行为目标区分开来。已经提出了“一只看不见的

①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 1994年版，第 27 页。

② 《道德情操论》第 229～230 页。

手”，尔后在《国富论》中加以充分阐述。这说明斯密在理论上清楚地区分了道德领域和经济领域中人从利己走向利他，是依靠不同的方式来实现的。

所谓“斯密问题”是后人提出来的，因为斯密显然把人在道德领域中的活动和在经济领域中的活动方式区分开来，似乎在经济领域中的活动，道德是不起作用的。尽管后人对此争论很多，但是仔细研究斯密的理论体系，他本人并不认为有“斯密问题”。在斯密看来，人类道德活动的目标和经济活动的目标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的一致，实现两者的互利。人的本性是利己的，每个人都企求个人私利，但要做到每个人的利益都能实现，只有在个人追求私利的同时又有利于公众利益。在道德领域中，人类天性存在的同情使个人从利己走向利他；在经济领域中，个人在追求自己经济利益过程中，依靠客观的经济运行机制——“一只看不见的手”实现了个人私利又增进了公众利益。虽然他没有评论它，然而在经济领域中做到满足个人私利又增进社会公利，这与道德领域中要达到的目标是一致的，在道德上也应予肯定，这是题中应有之义。

本著作之所以要对斯密思想花较大笔墨介绍和分析，因为他的思想和所谓的“斯密问题”，正是以市场经济代替自然经济的世界经济转型时期必然会提出来的，也是必须要解决的经济运行和道德建设的关系问题，关系到人类物质生产的发展与思想道德进步能否同步等重大问题，也关系到 21 世纪人类可否达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持续发展这个战略目标。

一般来说，经济理论上主张自由主义者，在经济与道德关系上都持有类似斯密的观点，都认为市场经济机制本身可以协调追求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关系，通过“看不见的手”可以达到两者一致。比斯密稍后的李嘉图更为前进了一步，他认为在经济活动中只要实行自由主义，其经济运行机制就会把个人利益和公众

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个人利益和公众利益相一致就是道德，就是符合社会历史的进步，道德与经济运行机制完全可以一致起来。李嘉图认为人类的欲望和爱好是无限的，需求也是无限的，每个人在满足自己欲望和爱好的同时也满足他人的欲望和爱好。因此，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时，与他人利益是一致的，关键是实现经济的自由主义。他写道：“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① 李嘉图的功绩在于，他看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追求利益的动机和行为实际上都会大大地促进公众利益，把个人利益和公众利益统一于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在他看来，一切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行为是合乎历史进程的，是合乎道德的，为此不惜牺牲社会一些阶级或者一些个人的利益。马克思称赞李嘉图的观点是“科学上的诚实”，^② 又说：“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李嘉图是完全正确的。他希望为生产而生产，这是正确的。如果像李嘉图的感伤主义的反对者们那样，断言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本身，那就是忘记了，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③

20世纪 30 至 60 年代盛行的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式微之后，70 年代以来，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又抬头，出现新经济自由主义思潮。这股思潮代表人物之一的密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生于 1912 年）在经济上提出“回到斯密”的口号。在经济活动与道德关系上，他坚持斯密的观点，认为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学理》，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11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Ⅱ），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125 页。

同上书，第 124 页。

“看不见的手”协调两者的关系，说斯密的“这只‘手’是他对一种方式的想象，在这种方式中，千百万人的自愿行动可通过价格体系来协调，而不需要指导中心。”^①如何证明市场运行存在客观的规则呢？弗里德曼别出心裁地说可以用“斯密的眼睛”来观察，他写道：“我们通过斯密的眼睛，却看到市场是一个秩序井然、有效地协调起来的体系，它产生于人们具有各自动机的行为，但又不是人们有意创造的。它是一个能把千百万人分散的知识和技能为了共同目标而协调配合的体系。”^②弗里德曼更为明确地指出，在道德方面，“在出于不利己的慈善目的而动员同情心方面，市场的看不见的手，都比政府的看不见的手远远更为有效”。^③道德领域中“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也是根本性，远比政府的有计划、有目的的行为更有效，他列举 19 世纪英国和美国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后，慈善性的公众福利设施通过自愿行动创办了很多。

至此我们可以作个简单的小结，从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到当代的新经济自由主义，把经济活动和道德统一在市场经济本身的运行机制上，称之为“看不见的手”。提出经济和道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这个统一之所以能够实现，原因有两个：一是人自身的利己本性，这是一种主观因素；二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这是客观因素。其中人性是动因，“看不见的手”是手段，利己又利人，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统一是目的。这是近代西方进入市场经济以来，解决经济与道德关系的经济伦理的一大思潮。

西方近代以来，解决经济与道德关系的另一大思潮，则强调人的心理因素、人文因素的决定性作用，目标则与经济自由主义

①② 《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 4 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30 页。

③ 同上书，第 130～131 页

学派相同，达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统一。

近代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法国的西斯蒙第（1773～1842年），他开始是斯密和李嘉图的追随者，继而反对他们的观点，创立了所谓“政治经济学的新原理”。他反对把经济和道德关系统一在生产力或客观的经济机制之上，反对为生产而生产、为财富而财富的观点。西斯蒙第提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不是为了增进财富而是为了人，为了人的物质福利，为了满足人的各种需要。他写道：“人一生下来，就给世界带来要满足他生活的一切需要和希望得到某些幸福的愿望，以及使他能够满足这些需要和愿望的劳动技能或本领。这种技能是他的财富的源泉；他的愿望和需要赋予他一种职业。人们所能使自己享有价值的一切，都是由自己的技能创造出来，他所创造的一切，都应该用于满足他的需要或他的愿望。”^①正因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及人的需要，所以它不是单纯的计算科学，而是伦理道德的科学，研究它既需要理智又需要良心。在研究中应关注人的需要、情感、热望，所以研究政治经济学“需要良心正如需要理智一样”。^②良心进入人们的经济活动并且以此指导经济活动，这意味着道德决定经济运行及其规律。从抽象意义上讲，如果把人和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理所当然地会得出西斯蒙第的结论，道德决定经济运行而不是相反。

因此，西斯蒙第对斯密、李嘉图的观点进行抨击，并且以现实生活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作为论证。他自称创立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即经济运行不是为财富而去增加财富，而应当是为了人。他们：“我要阐明的是：财富既然是人的一切物质享受的标志，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商务印书馆 1964年版，第 47页。

② 同上书，第 13页

我们就应该使它给所有的人带来幸福”。^①他还指出斯密等人的古典经济学派主张为生产而生产，为财富而财富，财富是大量增加了，却造成英国贫富差别越来越大。因此，他主张：“我们同亚当·斯密都一致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惟一源泉，节约是积累财富的惟一手段；但是，我们还要补充一句：享受是这种积累的惟一目的，只有增加了国民享受国民财富才算增加。”^②西斯蒙弟竭力宣扬财富属于人，应当为人所享受，他批评斯密及其学生们的学说正是“把人遗忘了”。^③西斯蒙弟的经济伦理观是把均贫富、关心人的需要、福利放在首位，把人人享有物质福利、人人丰衣足食作为经济和道德发展的终极目标，以全体居民的共同利益为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他主张这个任务应由政府来执行，说：“政府是为所属的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建立的；因此，它必须经常考虑全体人民的利益。正如应当利用高级政治向一切公民广施自由、道德和文化恩泽一样，政府应当通过政治经济学来为所有的人管理全民财产的利益；它应当设法维持秩序，使富人和穷人都享受到丰衣足食和安宁的生活，这种秩序不许国家里有任何人受苦，不许有任何人为自己的将来感到忧虑，不许有任何人不能以自己的劳动获得本人和自己的家庭所需的衣、食、住；要使人的生活变成一种享受，而不是一种负担。”^④

在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生产方式出现之后，即市场经济体制产生并发展之后，在经济和道德的关系上，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还是把人及人的福利放在首位；或者说，是从考虑经济发展出发，还是从道德、良心立场上出发，斯密和西斯蒙弟是完全对

①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 10 页。

② 同上书，第 45 页。

③ 同上书，第 49 页。

④ 同上书，第 77 页。

立的。从人出发，从道德立场考虑，这似乎很动听，亦符合人道、人权，然而却违背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妨碍人类社会的前进。马克思有个精辟的论述：“如果像西斯蒙弟那样，把个人的福利同这个目的（指李嘉图的为生产而生产——引者）对立起来，那就是主张，为了保证个人的福利，全人类的发展应当受到阻碍，因而，举例来说，就不能进行任何战争，因为战争无论如何会造成个人的死亡。（西斯蒙弟只是与那些掩盖这种对立、否认这种对立的经济学家相比较而言，才是正确的。）这种议论，就是不理解：‘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①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发展生产力是历史的必然，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付出精神的、文化的、道德的代价，以牺牲一部分人（工人）的利益为代价发展另一部分人（资本代表者）的利益，经济伦理服从这一无情的事实。

英国的经济学家西尼尔（1790～1846年）更为强调人，甚至把人的心理因素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趋乐避苦，在经济生活中表现为追求财富，具体表现为追求货币（钱）。西尼尔独创地把人的心理欲求量化为外在的金钱，以金钱数量作为心理因素的标志。他论证道：“一个人只要有了钱，就可以随其所好地满足他的种种奢望或虚荣，就可以使他懒惰度日，就可以发挥他急公好义的精神，或施行他私人间的恩惠，就可以千方百计地求得肉体上的快乐，避免肉体的劳苦，就可以用更大代价求得精神上的愉快。”^②人性的趋乐避苦是人的经济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24～125页。

② 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7～48页。

动的动因，人从事经济活动就是为了赚钱，避免过清贫生活而可以过享乐的生活。他说“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更多的财富”^①作为整个政治经济学体制的理论前提和论证的依据。

如果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从理论上会十分重视道德的作用，重视情感、亲情、友谊、爱等多种心理因素，重视人的种种欲望。假如每个人都如此，那么经济活动就成为满足人的欲求、心理需要的手段。法国的经济学家巴师夏（1801～1850年）就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而人的领域是多方面的，“伦理学科占有了属于‘同情’这个迷人领域的一切概念——诸如宗教的感情、父母的慈爱、孝道、爱情、友谊、爱国、慈善、礼节等等。剩下给政治经济学的只是个人利益这个冷酷的领域”。^②政治经济学研究个人追求利益的动因，其根本的心理因素是避免痛苦和满足欲望，并且又认为一个人的欲望靠另一个人的努力来满足，有时个人作出一些自我牺牲，但是会在以后得到回报。巴师夏以心理因素为契机，把人的经济活动又归之为道德伦理，认为人为满足自己欲望动因而从事经济活动，最终达到的却是人们互相满足欲望，互相服务。他说：“我们能够互相帮助，互相替代对方工作、提供相互服务，并且在有报酬的条件下，把我们的才能或运用这些才能的结果，交给别人支配。这就是社会。”^③互相服务论虽然掩盖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然而确实也反映了不同以往经济形态的市场经济中的人际关系，新的经济伦理亦因此而产生，因为在封建制度下不会有任何人提出地主和农奴是互相

①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 17 页。

② 巴师夏：《经济和谐》，引自《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196 页。

引自《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第 204 页。

服务的，在当时的人看来这绝对是荒谬绝伦的。

把心理因素作为经济和道德关系的切入点和基础，在现代奥地利学派中得到更为深入的阐发。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 1840~1921 年）和欧根·庞巴维克（Eugen Von Bohm-Bawerk 1851~1926 年）是主要代表人物。他们把整个经济活动过程归结为边际效用，以边际效用来分析、评价经济过程，而边际效用又取决于人的心理因素——欲望及需要，尤其是庞巴维克提出的所谓抽象方法，实际上就是把经济活动过程归结为心理因素。在庞巴维克看来，物品的价值主要由人的主观需求决定——即主观价值，交换过程就是交易双方的主观价值的交流和协调。他说：“主观价值是一种财货或一类财货对于物主福利所具有的重要性。在这一意义上，如果我认为我的福利同某一特定财货有关，占有它就能满足某种需要，能给予我以一种没有它就得不到的喜悦或愉快感，或者能使我免除一种没有它就必须忍受的痛苦，那么，我得说这一特定财货对我是有价值的。”^①也就是人的苦乐心理感受决定商品的价值，决定商品交换的过程是否能够完成。根据功利主义道德论的观点，满足人趋乐避苦本性的物品就是有用，就是合乎道德，尽管奥地利学派没有明确地说他们把经济和道德关系置于道德基础之上，而实际的理论确是如此。

英国剑桥学派创始人阿弗里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 年）则使经济运行中的“心理原则”系统化。他承袭前人的观点，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②研究人是“研究人类满足欲望的种种努力，然只以这种努力和欲望能用财富或它的一般代表物——即

① 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150 页。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23 页。

货币——来衡量。’^①在他看来，财富只不过是满足欲望的东西，同时又是人为满足欲望所作的努力的结果，经济学把财富看作人的欲望和努力以物化方式存在的形式。人的欲望和努力这两种心理因素决定了经济运行的种种方式、因素及结果，他以此提出边际效用递减理论：“人类本性的这种平凡而基本的倾向，可用欲望饱和规律或效用递减规律来说明，一物对任何人的全部效用（即此物给他的全部愉快或其他利益），会随着他对此物所有量的增加而增加，但不及所有量的增加那样快。如果他对此物的所有量是以同一的比率增加，则由此而得到的利益是以递减的比率增加。”^②心理因素是不可衡量的，但它们会量化为货币，货币成了人的心理因素的尺度，经济规律则可以用货币、心理原则来加以阐述。奥地利学派、马歇尔比起西斯蒙第等前人来，在经济伦理方法上应当说并无实质性突破，不过是把道德和经济之间的联系、道德在经济活动中的决定性作用，用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为中介、为连结点而已。

即使被西方经济学界誉为“凯恩斯革命”的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 年）的“三个基本的心理因素”理论也没有跳出前人的窠臼，他把经济发展过程的动因归结为人的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第一个基本心理规律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论证人的消费倾向是随收入增加反而消费减少，这是由人的天性决定的。凯恩斯认为人有爱好储蓄的倾向，收入增加就倾向于把更多的钱储蓄起来。他说：“无论从先验的人性看，或从经济中之具体的事实看，有一个基本心理法则，我们可以确信不疑。一般而论，当所得增加时，人们将增加其消费，但消费之

① 《经济学原理》（上卷）第 69 页。

② 同上书，第 112 页。